

“千里眼”的人性 with 神性

——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与蚕丛传说的历史印证^{*}

龙 红 王玲娟

提 要 从发生学上考察,殷商时期三星堆青铜面具的铸造与历史传说有某种渊源关系。就构成模式看,青铜面具与有关传说都起源于仪式化的再生模式;其设计铸造,本于祖先崇拜时期以神祖为中心的历史传说。三星堆“千里眼”造型,与蚕丛“目纵”的历史传说相互印证,彰显了三星堆艺术文化的人性 with 神性。

关键词 纵目造型 蚕丛传说 三星堆文化

有关三星堆遗址的说法多种多样——或祭祀坑说,或火葬坑说,或失灵灵物埋藏坑说,或亡国宝器埋藏坑说,或新王埋藏先王器物说等等。而作为造物设计物化形态的青铜面具,在三星堆文物中竟有百件之多,可谓举足轻重。这些青铜面具均为当时神庙中的不凡之物,乃是不争的事实。从发生学上考察,这些面具与有关历史传说有着共同的渊源。原始社会前期,常把动物、植物以及自然力、自然现象等看做“活物”,“从而产生了在模糊意识中的宗教的萌芽,也产生了许多类似童话或寓言的天真烂漫的故事。”^①三星堆面具就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它表明一个神灵偶像阶段在古蜀的真实存在。而就构成模式看,青铜面具与有关传说都起源于仪式化的再生模式。也可以说,青铜面具的设计铸造,当本于祖先崇拜期的以神祖为中心的历史传说。从古蜀有关的传说中,确能探索到这些奇异诡谲的青铜面具的内在模式与范型。这些模式与范型,与表征古蜀先民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的原型具有相似的结构模式。所以,“‘神的再生’是三星堆面具的一个重要主题,‘蜀人纵目’、‘金面罩人面具’在图腾仪式中成为具有‘再生’与‘复苏’功能的神器。”^②

^{*} 本文为2011年重庆大学文科立项资助重大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NO. CDJSK11005 资助”《中国古代造物设计与神话传说研究》和2009年度重庆大学大类系列课程建设项目“艺术史系列课程”(2009008A)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袁珂:《中国神话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② 苏宁:《三星堆的审美阐释》,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17页。

三星堆纵目青铜人面像糅合了人兽特点,其设计塑造方式,乃原始思维观念影响下的“功能叠加”,^①如人与兽、人与禽、兽与兽、禽与禽、兽与禽之间的怪异组合造型都是如此。这些形象符号的多元组合,是对超凡神性的强化,也是对神异力量的崇拜。早期社会组织与原始宗教之间存在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宗教人类学家认为,社会的往往就是宗教的。从社会发展与宗教演进历程来看,三星堆文化遗址中颇为突出的人兽结合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宗教信仰崇拜形式的演变,即从图腾主义向祖先崇拜的过渡。

翦伯赞先生曾经指出:“这种人兽混体的形象之创造,说明了当时的人类企图预予祖先的灵魂以图腾之威力,因而在人类与动物的肉体型上建立其关联,从而企图从肉体的关联达到灵魂的过渡。”“这些神灵,一方面是动物的人格化;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的动物化,就在动物的人格化与人类的动物化之相互的关系中,于是完成了由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之转化。”^②所以,很多历史传说恰恰是鲜活的信仰反映!上古典籍《山海经》中就有大量的人形与禽兽之形的丰富组合,从而在文献资料方面印证了以古蜀四川为中心的图腾时代的存在。另一方面,三星堆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则从造型实物的角度证明了《山海经》的描写决非凭空编造,而是有着实际的生活习惯和社会认识方式之来源,“一旦将之置入图腾文化加以考察,就形成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精神特质,其宗教内涵也就自然突显出来。”^③

二

在此特别要关注的是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器A型人面像。这种人面像共有三件,均为人兽合一,且“纵目”特征十分突出,不仅眼球成圆柱状,而且明显突出于眼眶之外(图一)。另外,双耳亦极尽夸张,大似兽耳,宽而扁的大嘴延至耳根,唇吻部的三重嘴角上翘,成微笑状,给人以神秘、诡异之感。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一双圆柱形的眼珠突出眼眶竟达16.5厘米,眼球直径达13.5厘米,眼柱中部还有一个条形带箍;鼻高而宽,鼻沟呈勾云纹状内卷,鼻孔呈上圆下方的马蹄形;下颌方正,有一匝粗短的络腮胡须;双耳尖长,上端尖斜伸出,长达70厘米,耳廓中装饰着勾云纹。另外两件鼻梁上方镶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似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怪诞而诡异。这几件人面像至今还保留着眼眉描黛、口唇涂朱之痕迹,似乎在强化巫术——宗教的神秘意味。

其实,三星堆面具中对眼睛进行夸饰的还有另外五种情况,它们也强化“双目”,渲染非凡的神采,“只是出现了一些程度不同的变异和改造。”^④

其一,几十对圆柱状的“铜泡”,或称“泡形眼饰”。其突起高度一般为3~10厘米,直径5~20厘米不等。在铜泡的边沿,均有数量不等的小孔,以便榫接或绑定铜泡,证明它们是组装在其他物体之上的。

① “功能叠加”一词,其义并非指功能的简单组合相加,乃笔者为准确阐释远古时期原始思维下造物设计活动所造,主要指向早期造物设计之种种怪异组合造型的复杂精神内涵。

② 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

③ 苏宁:《三星堆的审美阐释》,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93页。

④ 李学勤、范毓周主编,赵殿增著:《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第167页。

其二,20 多个大小不等、神态各异的铜面具。这些铜面具最大的宽达 61 厘米,最小者仅 15 厘米,基本作半圆筒形,耳侧有方形榫孔,浓眉大眼,眼角上翘,高鼻宽嘴,络腮胡须,耳廓作勾云纹状,上尖下圆。

其三,几十件眼睛状饰件。这些“人眼形饰件”分为四方菱形、大三角形、直角三角形等三种类型,分别做成人眼的全部、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当为人眼崇拜的供奉圣品。每个饰件上均有榫孔,可以将其组装在面具等器物上。有专家考证,这些眼形器均为宗庙里神像的眼睛,共同特点是瞳孔较突出,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

其四,勾云状的人眼和眼睛装饰构件。

其五,“人眼形花纹”装饰特征的、以“人眼”为母题变化出来的衣冠装饰,主要表现在大型青铜立人像的高冠两侧和外衣肩部等。

上述六种情形,均昭示着对人之“双目”的特殊信仰和崇拜。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不容忽视,即日常生活用器和装饰品,譬如陶质高柄杯圈足上刻画的眼睛形符号,以及一件相当于二里头时期的铜牌饰,直接用带瞳孔和睫毛的眼形器作为主要装饰。^①虽然并不都以“纵目”为主要造型,但都程度不等地在“纵目”上费了心思。比如,有大小不等、神态各异的 20 多个铜面具,“总体特征与突目大面具相似,只是眼珠(瞳孔部分)没有向外呈柱状突出。但这种面具的眼睛仍然很大,并呈橄榄状,眼球鼓起,呈现出一道凸棱。”^②

那么,三星堆文化遗址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纵目”造型呢?如此表现到底要传达什么信息?这些有着“纵目”的神人又是谁呢?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著名诗篇《蜀道难》中曾大为感叹:“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作为蜀地开国的帝王,蚕丛和鱼凫是何其艰难!五丁开山,又何其壮烈!在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艰险蜀地,可以想见,人们极其渴望能够有千里眼与顺风耳的特异功能!但是,这神异的功能又岂是平常人所能具有的!于是,传说中的开国帝王便成了最好的表现载体。造型艺术中出现纵目、大耳之形,不是也就顺理成章了吗?^③

李学勤先生等认为,这种面具可能是“纵目人”神像的一种,是为表达对蚕丛氏崇拜而制作的众多神像之一,都被作为祖先的化身和祭祀的对象。

古代文献记载中,明确有“纵目”特征的是蜀祖蚕丛。记载“蚕丛”的文献,据说主要有两部,一是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一是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④但有关蚕丛氏的文字,目前所见者仅有散存于其他著作中的十分有限的文字,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

① 陈德安著、姚顺先译:《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 页。

② 李学勤、范毓周主编,赵殿增著:《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第 168—169 页。

③ 关于“千里眼”与“顺风耳”,在巴蜀有不少传说,也生成了不少精彩的造型艺术作品。这些造型,在巴蜀文化发展史中当是承传有序的。譬如,开创于初唐永徽年间、发展于晚唐五代、隆盛于两宋的大足石刻艺术中,也有“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经典作品,与三星堆文化中青铜人像造型设计遥相呼应。正是在此意义上说,三星堆文明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中心的转移,金沙遗址文化也直接与之相承。

④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 1984 年版。

六朝文》卷五三：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太平御览》卷八八三所辑录文曰：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一作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礼之于湔。时蜀民稀少。

从上面蚕丛、柏灌与鱼凫的“三代各数百岁”传说可知，蚕丛氏在蜀的统治时间应该在“数百岁”，即以“蚕丛”为号的王朝前后持续了数百年。据考古学家们的推测，当时大概相当于中原的夏朝。

又有关于“蚕女”的文字，因资料珍贵难得，特录之于此：

蚕女者，当高辛氏之世，蜀地未立君长，各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遂相浸噬。广汉之墟，有人为邻土掠去已逾年，惟所乘之马犹在。其女思父，语焉：“若得父归，吾将嫁汝。”马遂迎父归。乃父不欲践言，马踟蹰不屹，父杀之，曝皮于庖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见皮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特别提到了“广汉之墟”四字，它与三星堆遗址之所在——今四川省广汉市，难道仅是一种巧合吗？

后来常璩的《华阳国志》中有关蚕丛氏的文字记载，则似乎依据了以上内容，又加以增益和整理，并纳入到中原文化大系统中，于是记载显得比较详细了，文学性增强了。^①其文曰：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誉，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立为祠。

“蜀侯蚕丛”，“蜀”和“蚕”有关系吗？

张启成认为，古蜀先民之祖神与“蚕”相关，包括蚕丛氏和更早的蜀山氏、西陵氏在内，这一氏族脉络均擅长于“种桑养蚕”，丝蚕业可谓古蜀人的国计民生之主业。“于是，卷曲的蚕身加上一个直（纵）目，便成为了该氏族聚落的图腾标志和地域色彩的显示标志。”^②此论聊备一说。

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蜀”字形体便是上为一只大眼睛，下为卷曲着身子的爬行动物。而在西周早期的《班簋》铭文^③与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蜀字除上部仍为大眼睛外，其下部变为了卷曲身子的虫形。殷、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蜀”字，应均指川西平原蚕丛氏之蜀。不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均十分突出其大眼睛特色，联系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可见当时的华夏民族与川西蜀族一样，在对蜀人祖神形象的认知上是基本相同的。^④

① 李学勤、范毓周主编，赵殿增著：《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第160—161页。

② 张启成：《中外神话与文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34页。

③ 容庚编：《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4页。

④ 陈德安著、姚顺先译：《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8页。

其实,从字源学上来看,“蚕”与“蜀”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说文解字·虫部》:“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之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①由此可见,“蜀”就是个象形字,上部“目”像头形,中间弯曲部分像其身子,“蜀”其实就是一种蚕。“蠶(蚕),任丝也。”^②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亦谓:孙诒让释蜀《契文举例》可从。为全体象形:上作目,乃头形之省;下部之形象其身蜎蜎之形,周甲与《说文》篆文同。^③因此,蚕是可以吐丝的虫子,蜀是蚕的一种,也是可以吐丝的虫子。由专事养蚕的职业到以此称谓君王乃至命名领地,与中国古代姓氏传统之一的以职业为姓,有异曲同工之妙。养蚕养蜀,所以君主以“蚕”称谓,领地以“蜀”命名,顺理成章,十分容易理解。

“蚕丛”养“蜀”,“蜀”乃“蚕”也。蚕丛“目纵”,在三星堆遗迹中得到了最充分最直观的展现。这是三星堆青铜面具与历史传说的互证,也是历史传说在造物设计中的立体显现。

可以说,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揭开了长久以来笼罩在古蜀王国头上的神秘面纱,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历史记忆中的古蜀王国并非子虚乌有!原先那些仅仅停留于人们口头或不多的文字记载的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终于找到了现实存在的有力依据。换言之,历史传说获得了实物的印证!有专家评价:“仅就青铜器来看,三星堆文化在与之同时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三代文化中居于较高地位。尤其是它显示出独特的土著文化特征,将巴蜀古史向前推进一千多年。更重要的是,巴蜀史研究专家们由于三星堆的出现,可以在神话意识的影响之外,进入到一个将考古实物材料引进古史研究的实证阶段。”^④此即历史传说与考古发掘形成了一种惊人的对应!

其实,其他珍贵的人类学资料也为此处的研讨提供了有力佐证。例如,北美穆斯圭安人的面具——斯瓦赫威面具,也是眼珠突出,作圆柱状。

实际上,在西方艺术史中,关于眼睛的表现形式、象征意义,以及眼睛与礼仪、宗教信仰之观念等也曾长期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对于眼睛威力的信仰可以激发人们制作偶像的热情,也可以体现在一种最常见的圣像破坏运动的形式中,即宗教敌人常常首先破坏绘画或雕刻的偶像的眼睛”。“破坏造像的眼睛能够最有效地毁灭其生命”,^⑤这不正好反证了对眼睛的威力信仰吗?眼睛的无比威力正是其高扬生命的神圣象征!夸大眼睛,无异于极度强化生命的状态和生存的状态。所以,巫鸿进一步指出:“青铜人像则是极为程式化的作品,具有极端自然主义的特征。大多数面具如此怪异,似乎出于对人、兽形态特征的幻想式的综合。艺术家们似乎是通过对人类自然形象的变形来赋予他们所创造的形象以超自然的性质。”^⑥正如列维-斯特劳所指出的:“在整个北美地区的神话里和仪式上,圆柱形扮演的角色在于把握和固定相距遥远的事物,并使之产生直接的沟通。”^⑦

①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9页。

② 许慎:《说文解字》,第283页。

③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4—1425页。

④ 苏宁:《三星堆的审美阐释》,第51页。

⑤ [美]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7—79页。

⑥ [美]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第84页。

⑦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著,张祖建译:《面具之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这便逐渐产生一种特别观念,突出的眼珠,不仅能够使目力大增,而且能壮大胆量。列维-斯特劳所举的例子耐人寻味,正好可以深化我们的理解。

因此,笔者认为:三星堆“纵目”面具,是历史上“蚕丛”传说的实物显现,突出地反映了古蜀的一种特殊信仰习俗——对具有超凡能力、超凡视野的神人的虔诚崇拜,对神人那双超凡而敏锐的双眼的虔诚崇拜;三星堆青铜面具的“千里眼”造型,充分展示了艺术创造中所蕴含的伟大的人性 with 神性。

三

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原型”与“原始意象”关系的精辟论证,从理论上可以帮助我们对此问题的深化理解。荣格说:“原型概念对集体无意识观点是不可缺少的,它指出了精神中各种确定形式的存在,这些形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普遍地存在着。”^①如果说“情结”是由个体无意识凝结而成的话,那么“原型”显示的即为“集体无意识”,故“原始意象总是集体的,即它至少对整个民族或时代来讲是普遍的。”荣格特别指出:“原始意象是一种记忆的沉淀,一种铭刻,它由无数类似的过程凝聚而成。它主要是一种凝结或沉淀,因而是某种不断发生的心理经验的典型的基本形式。因此,作为一种神话主题,它是永恒有效的,持续不断地或是为某种心理经验所程式化的表现。这样原始意象是一种决定于解剖学与心理学的沉淀的心理表达。”^②由此推之,三星堆青铜面具正是古蜀先民集体无意识中原型——原始意象遇到特殊情境(一种特别的宗教氛围)获得“瞬间再现”之后的物化形态,是一种象征性极其强烈的面具形式。其宽嘴、大眼、直眉、方耳、纵目等几乎成为一种具象与抽象有机结合的符号形式,决不与外部世界相吻合而主要源自内心复杂经验的沉淀、浓缩或凝集。拿荣格的话来讲,正为一种“非客观艺术”,即一种强烈主观色彩的表现,充分表达了古蜀先民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积淀,也就是一种无比深刻的种族记忆,彰显出“再生结构”所蕴涵的神秘功能。今天,人们觉得这些面具怪异,独特,甚至难以理解,因为它们不仅与现实世界中的人像不同,而且即使与兽像相较,亦有相当的距离。其实,只要联系历史,把握住其内在的创造原理及其内在的文化脉络,自然就会见怪不怪了。正如有学者对青铜面具制作过程的推想所论:“远古经验形成的原型在无意识中作用于人的幻想,青铜器制作者在制作之前,已在脑海中浮现出内心经验和幻觉所形成的象征符号。它不涉及现实世界的事物,只涉及通神的幻觉和象征,因为它的目的是要与神沟通,清除人世间的障碍,因此必然服从神灵的意志,这就是原型所规划的范畴。”^③

(作者通讯地址:龙红 重庆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401331)

王玲娟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400047)

(责任编辑 晓 文)

① 荣格著,冯川等译:《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荣格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83—84页。

② 转引自程金城:《西方原型美学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③ 苏宁:《三星堆的审美阐释》,第38—39页。